



# 魯迅雜文選讀

鲁迅杂文选读

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3·659 定价：0.35元

(内部发行)

# 毛主席语录

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，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，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。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，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。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，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，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、最勇敢、最坚决、最忠实、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。鲁迅的方向，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。

# 毛主席语录

鲁迅的两句诗，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。“千夫”在这里就是说敌人，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。“孺子”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。一切共产党员，一切革命家，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，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，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“牛”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
## 出版说明

为了帮助广大工农兵和中学语文教师学习、讲授鲁迅的杂文，我们约请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选了这本书。本书共选了鲁迅杂文十四篇，其中前期三篇，后期十一篇。每篇附有对人、事、典故和难词、难句的注释，对文章写作时代背景、主题、段落大意、现实意义的介绍和分析。这些注释和分析，不一定都很准确、精当，可能还有错误，希望读者指正。又：本书所选鲁迅杂文，是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出版的《鲁迅全集》排印的，如有和该社将出的新版本不同处，请以新版本为准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未有天才之前·····           | 1   |
| 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·····      | 14  |
| 写在《坟》后面·····          | 39  |
| 文学和出汗·····            | 55  |
|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·····       | 64  |
|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·····      | 74  |
| “丧家的”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·····   | 90  |
| “友邦惊诧”论 ·····         | 101 |
|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·····      | 111 |
|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·····       | 125 |
|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·····        | 143 |
| 半夏小集 ·····            | 156 |
|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····· | 170 |
| 死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202 |

30-261

# 未有天才之前<sup>①</sup>

——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

大学附属中学校校友会讲——

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，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，但推托拖延得太久了，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。

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，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，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：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，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。天才究竟有没有？也许有着罢，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。倘使据了见闻，就可以说没有，不但天才，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。

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，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，长育出来的，所以没有这种民众，就没有天才。有一回拿破仑过 AlpS<sup>②</sup> 山，说，“我比 AlpS 山还要高！”这何等英伟，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；倘没有兵，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，他的举动，言语，都离了英雄的界线，要归入疯子一类了。所以我想，

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，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。——譬如想有乔木，想看好花，一定要有好土；没有土，便没有花木了；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。花木非有土不可，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。

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，一面固然要求天才，一面却要他灭亡，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。举出几样来说：

其一就是“整理国故”③。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，其实何尝有力，而一群老头子，还有少年，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，他们说，“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，都不整理保存，倒去求新，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。”抬出祖宗来说法，那自然是极威严的，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，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。就现状而言，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，老先生要整理国故，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，至于青年，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，各干各事，也还没有大妨害的，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，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。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，那更是荒谬绝伦！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，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，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，农夫，工匠等类，说是忘记了祖宗；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。

其一是“崇拜创作”。从表面上看来，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，其实不然。那精神中，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，异域情调的分子，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。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，都介涅夫，陀思妥夫斯奇④的名字，已经厌听了，然而他们的著作，有什么译到中国来？眼光囚在一国里，听谈彼得和约翰⑤就生厌，定须张三李

四才行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，从实说，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，文笔或者漂亮，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，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，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，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，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，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。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，排斥异流，抬上国粹，那里会有天才产生？即使产生了，也是活不下去的。

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，不是泥土，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！

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。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，也由来已久了，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。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，不象批评家，作品才到面前，便恨恨地磨墨，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，“唉，幼稚得很。中国要天才！”到后来，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，他是听来的。其实即使天才，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，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，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。因为幼稚，当头加以戕贼，也可以萎死的。我亲见几个作者，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。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，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。

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，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；然而遭殃的是嫩苗——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。幼稚对于老成，有如孩子对于老人，决没有什么耻辱；作品也一样，起初幼稚，不算耻辱的。因为倘不遭了戕贼⑥，他就会生长，成熟，老成；独有老衰和腐败，倒是无药可救的事！我以为幼稚的人，或者老大的人，如有幼稚的心，就说幼稚的话，只

为自己要说而说，说出之后，至多到印出之后，自己的事就完了，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，都可以置之不理的！

就是在座的诸君，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，然而情形是这样，不但产生天才难，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。我想，天才大半是天赋的；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，似乎大家都可以做。做土的功效，比要求天才还切近；否则，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，也因为没有泥土，不能发达，要象一碟子绿豆芽。

做土要扩大了精神，就是收纳新潮，脱离旧套，能够容纳，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；又要不怕做小事业，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，否则翻译，介绍，欣赏，读，看，消闲⑦都可以。以文艺来消闲，说来似乎有些可笑，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。

泥土和天才比，当然是不足齿数的，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，也怕不容易做；不过事在人为，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。这一点，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，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。而且也有报酬，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，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，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，正不必花卉自身，这才心旷神怡的——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⑧。

## 注 释

-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《校友会刊》第一期。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《京报副刊》第二十一号转载时，前面有作者写给该刊主编孙伏园的一段话：“伏园兄：今天看看正月间在师大附中的演讲，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，所以校正寄奉，以备转载。二十二

日夜，迅上。”此文后由作者收入《坟》。

②Alps 山，即阿尔卑斯山，欧洲最高大的山脉。西起法国东南部的尼斯，经瑞士南部、意大利北部，东到奥地利的维也纳。法国拿破仑在一七九七年进兵意大利同奥军作战时，曾越过此山。

③“整理国故”，这是当时胡适所鼓吹的一种反动运动。胡适（一八九一——一九六三），买办资产阶级文人、政客。辛亥革命前后几年里，留学美国，接受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。他是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卒，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帮凶。

④托尔斯泰、郭尔涅夫、陀思妥夫斯奇，都是俄国作家。现通译为托尔斯泰（一八二八——一九一〇）、屠格涅夫（一八一八——一八八三）、陀思妥耶夫斯基（一八二一——一八八一）。

⑤彼得和约翰，是俄国人和英国人常用的名字，正如中国称张三和李四一样。

⑥戕(qiāng 腔)贼，摧毁、伤害的意思。

⑦消闲，在这里是讽刺性的说法，意思是，即使以文艺来消闲，也比恶意批评家任意摧残新文艺要好。

⑧“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……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”，这是一种拟人化的写法。意思是，好花从泥土里出来后，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，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。这样，不仅好花自身感到心情开朗，精神愉快，而且，培养好花的泥土也会感到高兴。

## 内容分析

一九二三年，正处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夕。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以工人罢工斗争为主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。一九二二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工人“二·七”大罢工，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，“五四”新文学阵营发生

了剧烈的分化：作为五四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大部分和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妥协，站在反动方面了；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仍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深入发展，文艺社团和刊物不断涌现，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继续写了许多著名的小说和杂文，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斗争。但是在这个时期，一些参加过五四文学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颓唐、落伍，新出现的文艺青年，也大多为小资产阶级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他们虽然不满现实的黑暗，倾向于革命，但由于脱离群众，脱离现实斗争，一时找不到正确道路，所以作品往往题材狭窄，感伤颓废。当时共产党人邓中夏、恽代英、肖楚女等人曾写文章对这种现状进行分析，批判了许多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“怨天尤人的颓废主义”、“不问社会的个人主义”等错误倾向，号召他们“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”，“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”。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满足于文艺界的现状，迫切希望改变新文艺“青黄不接”、“暮气深沉”的局面。于是，在当时的报章杂志上普遍地出现了要求“天才”的“盛大”的呼声。

但是，当时文艺界出现的种种反动的、错误的思潮却严重地阻碍了新文化、新艺术的成长。买办资产阶级文人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胡适之流，继一九一九年提出“整理国故”的反动口号之后，又于一九二二、一九二三年创办了《读书杂志》、《国学季刊》，大肆鼓吹封建文化，妄图阻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，引诱青年“踱进研究室”，埋头故纸堆，脱离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。同时，一些封建阶级、资产阶级文人，用了各种批评的尺子，到文坛上来践踏，肆意笑骂新文艺。

一些人则贬低翻译外国进步文艺的作用，片面地鼓吹文艺创作。此外，在要求天才的呼声中，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文艺是“天才”的产物，呼唤所谓“超人”的“真的艺术家”、“真的天才”的出现，表现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鲁迅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作了《未有天才之前》的讲演，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，有力地批判了妨害新文学艺术发展的种种“论调和趋势”，深刻地阐明了天才与群众的关系，肯定了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。整个讲话，闪耀着战斗的唯物主义的光辉。

鲁迅首先从要求天才的呼声谈起，分析了文艺界的现状。鲁迅认为，当时文艺界不但没有天才，而且连“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”也没有。这说明他与那些呼吁天才的唯心主义观点不同，一开始就把眼光放在了人民群众身上，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，同时也表明他对当时文化界种种错误思潮对人民群众的毒害，有深切的感受和清醒的认识。

历来的剥削阶级为了愚弄、奴役人民群众，巩固其反动统治，总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。五四运动以后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御用文人，也跳出来诬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渣滓，鼓吹“天才”和“英雄”创造历史的谬论，妄图阻挡人民群众的革命洪流，维护一小撮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。二十年代初期新文艺界的许多小资产阶级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这种传统的唯心主义的影响，在他们不满和要求变革文艺现状的呼声中，也掺杂着这种反动阶级的思想毒素。鲁迅明确指出：“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，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，长育出来的，所以没有这种民众，

就没有天才。”鲁迅以极其精辟、深刻的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天才产生于群众，没有群众就无所谓天才的观点，有力地批判了剥削阶级的天才论，拨开了在天才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迷雾，指明了面向现实、植根群众对于发展新文艺的重要性。

西方资产阶级总是把拿破仑吹嘘为所谓英雄造时势的风云人物，拿破仑也自我吹嘘“比 Alps 山还要高”。可是，鲁迅讽刺地指出，这是因为他“后面跟着许多兵”的缘故。后来拿破仑率领六十万大军进攻俄国，遭到惨败，几乎只身返回巴黎时，便不成其为“英雄”了。鲁迅还以好花、乔木离不开好土的通俗比喻，生动地说明了天才决不是什么“天生之才”，好的文艺作品决不是凭空产生的，而是群众革命实践活动的产物。所以，鲁迅大声疾呼：“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，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。”并强调指出：“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。”

可是，当时“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”，却不但要扼杀新文艺，使天才灭亡，甚至要毒害群众，“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”。所以，鲁迅在正面摆出了自己的论点之后，针对这些论调和趋势，一一进行了揭露和批判。

鲁迅尖锐批判了“整理国故”的论调。所谓“国故”，就是指腐朽的封建文化。五四新文化运动向封建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冲击。但是，资产阶级不可能同封建传统作彻底的决裂，五四运动后，资产阶级文人胡适，与封建遗老遗少所掀起的复古主义逆流互相配合，提出了“整理国故”的反动口号，甚至以“导师”自居，给青年开了一个将近二百部（其中包括二十部佛经）的“国学书目”，引诱青年钻故纸堆，腐蚀青年，瓦解

革命力量。当时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《中国青年》和创造社的刊物《创造周报》都曾发表文章加以抨击。鲁迅在这篇文章及《青年必读书》、《导师》、《一点比喻》等杂文中更给予了有力的驳斥。在这篇文章中，鲁迅首先把整理文化遗产与胡适之流的“整理国故”严格区别开来。胡适一伙“抬出祖宗来说法”，把腐朽的封建文化美化为“好东西”加以“整理保存”；革命者的态度则正如鲁迅所指出的：“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，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。”就是说，一方面，对待文化遗产必须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，“洗净叠好”；另一方面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收纳新思潮，创造新文化。这就与胡适之流奉封建糟粕为至宝的复古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其次，鲁迅指出：“至于青年，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”，就是说，主要的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引导他们向前看，投入现实斗争。可是，胡适一伙却把“整理保存”腐朽的封建文化作为“旗子”来号召，要青年同他们一起“埋在南窗下读死书”，并且“以为非此不可”。鲁迅嘲笑他们说，这些家伙实在远不如一个古董商人“聪明”，因为古董商人虽然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，但决不痛骂不搞古董的其他人“忘记了祖宗”。这样，通过深入的解剖和辛辣的讽刺，就有力地揭露了胡适之流“要中国永远与世隔绝”，破坏革命运动，反对新文化新艺术的反革命实质。

对所谓“崇拜创作”，鲁迅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上，考察其本质，指出这种论调正起了“排斥外来思想，异域情调”的作用，其结果必然同“整理国故”一样，是“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”。当时文艺界的现状正是如此，外国的进步

文艺翻译介绍得很少，许多人“眼光囚在一国里”，凡是外国的东西，不分是非好坏，一概厌恶；凡是中国的东西，不管青红皂白，一律欢迎。这就势必只会在封建文化的泥坑里打滚。

与此相反，鲁迅自己除了进行创作以外，还一贯重视翻译和介绍外国的进步文艺，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作品。早在留学日本时，他就针对当时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状，于一九〇七年发表了论文《摩罗诗力说》，一九〇九年出版了《域外小说集》，翻译或介绍北欧、印度、波兰、匈牙利等国作家的作品，热情地宣传“立意在反抗，指归在动作”的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。他在自己的创作中，也善于批判地吸取外国进步文艺的精华，作为从现实斗争出发创造新文艺的借鉴。其实，当时其他作家的一些较好的作品，也受了外国作品的“技术和神情”的影响，因而文笔比较漂亮。但是，由于眼光短浅，思想狭隘，往往为了迎合“中国人的老脾气”，在作品里塞进些封建伦理的“传统思想”，使读者的眼界渐渐狭小，“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”，看不到奔腾向前的革命潮流，离开如火如荼的斗争实践。这类作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，就是作者和读者一起，“排斥异流，抬上国粹”，这样，“那里会有天才产生？即使产生了，也是活不下去的”。鲁迅强调指出，此种情况下的民众，也就不可能成为“使天才得以生长”的土壤，而是一无所用的“灰尘”，而灰尘是根本“长不出好花和乔木”的。这就进一步揭露了“崇拜创作”这种论调的实质，指出了它对革命人民的消极作用。

至于恶意的批评，鲁迅指出，这些所谓“批评家”，其实

是对新文化、新文艺心怀不满的“不平家”。他们不过是借文艺批评之名，行摧残新文化、新艺术之实。这些人“作品才到面前，便恨恨地磨墨，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，‘唉，幼稚得很。中国要天才！’”活画出他们对新文艺专横、粗暴的面孔，揭露了他们以要求天才为口实，残酷地戕贼革命的新生力量的行径。鲁迅站在战斗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上，以对新事物的满腔热情，指出，“即使天才，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，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，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。”这个生动的比喻通俗地阐明了，人的一切知识和才能都是后天才有的，所谓“天生之才”完全是欺人之谈；好的文艺作品也是作者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深入生活，坚持创作实践的结果。

鲁迅曾经指出：“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，还得灌溉佳花，——佳花的苗。”作为一个革命的文艺批评家，鲁迅自己就是这样做的。他的战斗的杂文对于敌人和“恶草”，是匕首和投枪，能够以一击制强敌于死命。然而他对于人民，对于“佳花”及“佳花的苗”，却是一个辛勤的园丁，为培育新的革命文艺，为在文艺战线上造出大群新的战士坚持不懈地工作着。他总是肯定革命的新事物的重大意义，认为“嫩苗”是能够茁壮成长的，他说：“幼稚对于老成，有如孩子对于老人，决没有什么耻辱；作品也一样，起初幼稚，不算耻辱的。因为倘不遭了戕贼，他就会生长，成熟，老成；独有老衰和腐败，倒是无药可救的事！”新文化新艺术，开始虽然比较幼稚，但它必然在斗争中成长壮大，与此相反，剥削阶级的旧文化却只有“老衰和腐败”，直至灭亡。革命的文艺批评的一